論　著

戰爭從來不只是男人的事業：解讀新四軍女兵回憶錄

潘以紅*

摘要

1937 年 7 月抗戰爆發之際，有大批受過教育的女性離開她們的家庭，投身抗戰救國事業。本文選擇新四軍女兵的戰爭回憶作案例研究，探討她們對政治、軍事、社會和性別經驗的描述及反思。主要論點是，儘管她們選擇性的回憶認同婦女解放必須從屬於民族解放的理論，個人必須服從組織，軍隊是革命大家庭等觀念，並盡量避開個人的內心衝突和政治敏感問題，在改革開放時期大陸對中共

* 美國俄亥俄州邁阿密大學教授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 24 期（2014 年 12 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歷史的重新研究和詮釋的背景之下，她們回憶錄的問世，具有糾正婦女歷史的邊緣化，開闢中共女性自己聲音的公共出版空間的意義。新四軍女兵的自我書寫再現了新四軍在抗戰時期的另種面目。在各種有關新四軍歷史的政治投射中，女性的聲音提供了性別與戰爭的經驗，是國家聲音之外的另一種聲音。比起「毛時代」塑造的神人化抗戰女英雄，她們筆下的女兵更為真實，塑造了另一類革命女性的形象，更具有改變社會的主動性和自立精神。女兵的書寫採用女性的視角，講述她們作為戰士、妻子和母親的經歷，強調戰爭對女性比對男性更為殘酷的一面。按女權主義的觀點，她們絕大多數在戰爭中所從事的仍然是屬於傳統性別分工的女性工作，但是她們以回憶書寫確認她們的人生價值，強調女兵和男兵一樣做出了貢獻，戰爭從來不只是男人的事業。

關鍵詞：抗戰、抗戰回憶、新四軍、新四軍女兵

前　言

1938 年 11 月初冬，美國記者Agnes Smedley到皖南雲嶺新四軍軍部開始了近一年的採訪工作。Smedley向 17 歲的女兵王于耕(1921-1993)和另一位女兵提出一連串的問題：為什麼要當女兵？為什麼不繼續念書了？不想家嗎？是女兵，為什麼不上前線打仗？王和同伴對Smedley的問題一一作答：當兵為了救國；部隊就是學校，抗戰是特殊的教育；想家，

所以一定要打回老家去。至於到前方作戰，她們問：「史沫特萊女士，您不是也在參加中國抗戰麼，您並沒有拿槍去打仗呀！」戰爭需要人去作各種不同工作，女兵擔負的工作同樣是重要的一部分。[1]

王于耕出生在保定一個小康人家。七七事變以後，她中斷了在保定女子師範學校的學業，不辭而別，離開日本飛機轟炸之下的保定，參加了在山西臨汾的八路軍學兵隊。短期訓練結束之後，在 1938 年初加入新四軍。1940 年和新四軍將領葉飛結婚。[2] 王于耕在她 1980 年代發表的回憶錄中，描述了這次雲嶺訪談。她的回憶錄收在 2003 年出版的《鐵流：鐵軍巾幗譜》。這本書是幾十位新四軍女戰士的回憶錄文集，有部分文章是男性或是戰友對女戰士的回憶。

1937 年抗戰爆發以後，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之下，大批像王于耕這樣的女學生參加了抗戰，或赴延安，或加入在其他根據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延安、太行山和新四軍女兵都出有回憶錄。[3] 也有大批女學生加入國民黨在各地的政治幹部

1 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鐵流：鐵軍巾幗譜》（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頁 176（以下簡稱：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

2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 146-152、193。本書王于畊即王于耕。

3 自 1980 年代以來，中共出版了不少紅軍、八路軍和延安女性的傳記和回憶錄。例如，瞭望編輯部，《紅軍女英雄傳》（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紀念延安女大五十周年籌委會，《延安女大，1939-1989》（北京：未注明出版社，1989）；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北京校友會，《延水情》（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9）。太行山中共女兵回憶見：師德清主編，《烽火太行半邊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訓練班，從事戰地服務，參加新生活婦女指導委員會在各地的民眾婦女組織工作。當時廣西女學生軍十分有名。1944 年國民政府頒布了《全國知識女青年志願服務隊徵集辦法》，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激勵之下，女青年從軍達到高峰。[4] 國民黨女性也出版了抗戰時期的回憶錄和口述歷史。[5] 本文探討中共女性書寫的戰爭回憶，選擇新四軍女兵作案例研究。

另見：張西，《抗戰女性檔案》（北京：青年出版社，2007）。此書為紀實文學，依據大量採訪和史料，講述了二十多位年輕女性背離富裕家庭參加八路軍，在「大青山突圍」戰役中抵抗日本侵略者，最後犧牲的事蹟。朱鴻召，《延安曾經是天堂》（西安：陝西出版集團，陝西人民出版社，2012）。此書引用了很多中共男性和女性的回憶及其他史料和專著。

4 沈茲九，《抗戰中的女戰士》（廣州：戰時出版社，193？）；李應芬，〈廣西各縣婦運情況調查總結(1941)〉，收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頁 558-589；梁惠錦，〈抗戰時期的婦女組織〉，收入鮑家麟主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 359-390；呂芳上，〈抗戰時期中國的婦運工作〉，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頁 378-412；聞黎明，〈關於西南聯合大學戰時從軍運動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期 3 (2010)，頁 5-18；孫玉芹、劉敬忠，〈抗戰末期的「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評述〉，《抗日戰爭研究》，期 3 (2010)，頁 19-27。

5 例如謝冰瑩，《抗戰日記》（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Virginia C. Li, *From One Root Many Flowers: A Century of Famil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Amherst: Prometheus Books, 2003);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叢書：游鑑明訪問，黃銘明、鄭麗榕紀錄，《春蠶到死絲方盡：邵夢蘭女士訪問紀錄》(2005)；張朋園訪問，羅久蓉，《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1993)；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紀錄》(1995)；許雪姬、沈懷玉訪問，曾金蘭紀錄，《陳湄泉先生訪問紀錄》(1996)。

新四軍女兵的編制和總人數究竟為何仍難以查清，但女兵留下名字的至少有 980 人，[6] 她們集體出版了回憶錄。史料涉及了較全面的政治、軍事、社會和性別經驗，以及新四軍的歷史。本文重點在中共女兵對戰爭的回憶，而不在比較新四軍女兵和延安及八路軍女性以及中共女兵和國民黨女兵的經歷。這類比較非常重要，因涉及不同的地理環境、政治背景等問題，有待於進一步的專題研究。本文研究重點也不在比較新四軍和紅軍時代的女性經歷。本文所使用的主要原始資料除《鐵流：鐵軍巾幗譜》(以下簡稱《鐵軍巾幗譜》)以外，還包括(1)新四軍五師的女兵回憶文集《中原女戰士》；[7] (2)王于畊(即王于耕)的回憶文集《往事灼灼》，這是作者陸續發表過的 9 篇回憶文章集結。

比較《鐵軍巾幗譜》和《中原女戰士》兩書，王于畊的回憶有更多的歷史細節和個人的感受。[8] 王的回憶成為人們瞭解新四軍女戰士的重要史料。2009 年上海電視傳媒公司完成出品的一部長達 30 集，每集 41 分鐘左右的電視連續劇《新四軍女兵》採用了王的回憶。[9] 2010 年由安徽衛視臺播映的第一部關於新四軍女戰士的電視紀錄片《我的母親：三

---

6 朱虹主編，《中原女戰士》（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4），下輯，頁 643。

7 朱虹主編，《中原女戰士》（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上輯；中輯(1992)；下輯(1994)。

8 王于畊，《往事灼灼》（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再版）。這是作者先後發表過的 9 篇回憶文章的集結。

9 丁黑導演，《新四軍女兵》（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上海電視傳媒公司出品，2009）。http://tv.cntv.cn/video/C28345/f5be8a7e44e14fba5b691fb8d1e1d517（2014 年 7 月 3 日至 25 日檢索）。

個新四軍女兵的故事》，以王于畊、張茜、凌奔的生涯為主軸，引領觀眾跟隨她們的子女走過三位女兵生活過的地方，追溯她們從十幾歲投身革命，直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和文革中的曲折經歷。紀錄片穿插了拍攝時仍然健在的老新四軍女兵的談話和歷史學家的評論。[10] 新四軍的「紅二代」王于畊的女兒葉葳葳和張茜之子陳丹淮等人還編寫了傳記文學《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11] 大陸學者朱強娣的《新四軍女兵》是一部根據史料和採訪寫成的紀實文學，對《鐵軍巾幗譜》和《中原女戰士》有人物事蹟和背景史料的補充價值。此書描述了新四軍女兵「比男子付出更多的辛勞和心血，作出更多的犧牲和奉獻」的戰爭經歷，目的在歌頌她們的心靈和青春光彩。[12]

抗戰對參戰的中國婦女有什麼影響？中共宏觀歷史敘述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中國婦女對抗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由此極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政治覺悟和社會地位。[13] 自 1980

10 張蘇洲、陳丹淮、葉葳葳總策劃，陳小津、趙紅梅總監製，《我的母親：三個新四軍女兵的故事》（上海中航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安徽廣播電視臺聯合製作，2010）。中國網絡電視臺可以看到此片：http://tv.cntv.cn/video/C23105/a8ba6459261a4b3f603b3986dabd489f（2014 年 8 月 2 日至 7 日檢索）。

11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張、王、凌分別是新四軍將領陳毅、葉飛、鐘期光的夫人。

12 朱強娣，《新四軍女兵》（濟南：濟南出版社，2004）。感謝評審人提點我關注此書。

13 蔡暢，〈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的關係〉，收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蔡暢、鄧穎超、康克清婦女解放問題文選，1938-1987》（北京：人

年代起，在中國經濟轉型、政治環境逐漸寬鬆的背景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史及全國婦聯的研究室出版的有關中國婦女抗戰的文獻史料和專輯，也堅持了這個觀點。

與上述觀點形成對照的是，有些女權主義學者強調，中共並沒有完全履行男女平等的承諾。抗戰八年，中國婦女的地位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14] 中共的婦女政策是一切服從民族解放的需要。[15] Elisabeth Croll認為，為了滿足團結一致抵禦日本侵略的需要，中共沒有能力顧及平等，不可能消除兩性和階級的差別。[16] Judith Stacey提出的論點是，戰爭強化了中共的軍事性質。為了發動人民戰爭，中共必須保證農民的支持。為此中共在根據地實施的經濟、軍事和家庭政策，只能從屬於「民主父權制」，即賦予男性農民「民主」，給他們更多的權力。[17] 激進的女權主義者認為，直接拿槍參戰是婦女擺脫父權主義的必要一步。[18] 然而中共排斥婦女於戰

民出版社，1983），頁 163-164。

14 Patricia Stranahan, *Yan'an Wome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3).

15 Yihong Pan,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 1 (February 1997), pp. 115-130.

16 Elisabeth 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p. 210.

17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116; chap. 4 and 5.

18 Francine D'Amico,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Women Warriors," in Lois Ann Lorentzen and Jennifer E. Turpin, eds., *The Women and War Read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20.

鬥人員的編制之外，僅讓她們承擔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中女性責任的後勤和附屬工作。[19] 更有人指出，中共在抗戰中實際上採取了反對婦女利益的立場，阻止婦女幹部對性別歧視進行抵制，壓抑對黨內男女不平等進行批評的話語權。[20] 同時，中共軍隊干預個人選擇婚姻配偶，與「公共父權」遙相呼應。[21]

以上學者關注的是中共的婦女政策。本文探討的問題是：中共女性本人的經歷和她們對自身的認識又是如何？美國歷史學者Christina Gilmartin在對 1921-1927 年間中共女性的研究中，把關注視角轉向了女性本人的經歷。通過分析中共父權主義與中共女性主動性兩者之間複雜變動的關係，她所得出的結論是，中共是一個男權主導的政黨，而共產黨女性容忍了黨內的不平等，因為在這一政治組織中，她們開闢了自己的活動空間，創立了自己的文化和生活。這批女權主義者對中共的父權也進行了抵制，更重要的是，她們在推動社會變革中，發揮了重要的領導力量。同時Gilmartin也指出，她們對黨內性別不平等的姑息，使黨內父權主義得以延續。[22] Helen Young所編著的長征女紅軍的口述史表明，在講

---

[19] Jane Price, “Women and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1-1945,”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7:1 (January-March 1975), pp. 19-24.

[20] Delia Davin,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p. 36-40;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p. 166-167; 170-171.

[21]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 172.

[22] Christina K.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述自己的經歷時，女兵更注重強調她們的貢獻和英勇，而避免提及在黨內所受到的性別歧視。[23] Nicola Spakowski在對1930-1940 年代中共婦女的軍事參與研究中指出，八年抗戰中，儘管中共把大部分婦女置於非戰鬥員之外的工作崗位上，有部分婦女向黨的排斥政策提出了挑戰，她們「第一次提出了婦女有權參戰的問題」。而且，在游擊區中，婦女實際上有很多機會直接捲入戰爭。[24]

迄今為止，以抗戰時期婦女經歷為主題的學術專著為數有限。[25] 本文的新四軍女兵回憶分析，希望能填補部分空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204-205.

23 Helen P. Young, *Choosing Revolution: Chinese Women Soldiers on the Long M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Yihong Pan, "Their 'Quiet' Devotion: Communist Wome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7-1945),"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6: 1 (spring 2009), pp. 1-26.

24 Nicola Spakowski, "Women's Militar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of the 1930s and 1940s: Pattern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 Mechthild Leutner and Nicola Spakowski, eds., *Women in China: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 p. 160.

25 關於中國婦女戰爭經歷的英文專著，見 Mary Sheridan and Janet W. Salaff, eds, *Lives, Chinese Working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Denyse Verschuur-Basse, *Chinese Women Speak* (Westport: Praeger, 1996); Nicola Spakowski, "Women's Military Participation," pp. 151-160; Pan, "Their 'Quiet' Devotion," Joshua H. Howard,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s, 1937-195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nke Li, *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Yu Chien-ming, "Beyond Rewriting Life History: Three Female Interviewees'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War," in Joan Judge and Hu Ying, eds., *Beyond Exemplar Tales: 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白。主要論點為，新四軍女兵出版回憶錄，目的在於糾正婦女史在毛澤東時代所受到的忽視和邊緣化，在中國抗戰歷史中書寫屬於性別經驗的篇章。跟「毛時代」對抗戰女英雄的神人化模式相比，她們的個人書寫讓讀者看到了較為人性化的、普通女戰士的人生歷程，同時也塑造了另一類新的革命女性形象。研究她們對個人經歷的描述，有助於我們理解分析她們怎樣用自己的邏輯和話語來認識自我，肯定自我價值。在中國社會向商業、消費社會的轉型中，她們追求的自尊、自信、自強、自立的精神可以成為轉型時代的榜樣。和 1937 年以前的中共婦女相較，抗戰一代的中共女性也容忍了黨內的性別不平等，這是因為在她們看來，民族解放事業高於婦女的利益；她們對共產黨員、革命大家庭成員的身分認同，給了她們強烈的集體歸屬感和個人服從集體的觀念。同時，她們確確實實參與了抵禦外敵和改造社會的事業，並從中深切體會到自己生活的意義，所以她們說：「革命和革命戰爭，從來都不光是男人的事業。」[26] 抗戰的勝利，女兵的貢獻和業績「功不可沒」。[27]

一、毛澤東時代抗戰女性的「女神」化與後毛時代抗戰女性的人性化

Global, Area, and International Arch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262-279.

26 朱虹主編，《中原女戰士》，上輯，頁 2。

27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2。

毛澤東時代的宏大歷史敘事強調，中國婦女在抗戰中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因而提高了本身的政治覺悟和社會地位。但是，為了繼續鞏固早在延安時期就已開始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掩蓋黨內鬥爭分歧和抗戰中的戰略錯誤，例如造成皖南事變中共方面的原因，新四軍的歷史和其他中共男性領導人和除延安以外的根據地在抗戰中的作用，都在中共敘事中被掩蓋、被邊緣化。[28] 婦女的抗戰史也不被重視。

實際上，在抗戰期間，中共對抗戰女性的事蹟也有報導，但書寫的主要目的是在宣傳教育，樹立榜樣以激勵民眾。例如延安時代宣傳的支援前線、增產模範、勞動英雄，為的是鼓動大生產運動。[29] 1949 年以後，各種媒體──報刊、雜誌、廣播、文學、文藝作品──也發表了不少中共女性在革命時期的事蹟。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出版的《中國婦女》刊物，更成為宣傳婦女人物的重要平臺。這些英雄的傳記書寫表現了女性改變社會的主動性，但因為只凸顯她們的英雄特點，缺少人物的具體和真實性，目的是宣傳英雄形象，向年

---

28 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Surrey: Curzon, 1999), pp. 6-7; David S. G. Goodman, “Revolutionary Women and Women in the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Wome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The China Quarterly* 164 (December 2000), p. 916;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65.

29 Mary Sheridan, “Yenan Women In Revolution,” in Mary Sheridan and Janet W. Salaff, eds., *Lives, Chinese Working Women*, pp. 180-196; Patricia Stranahan, *Yan’an Wome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pp. 67-74.

輕一代灌輸共產主義的道德和理想，結果是把她們「女神」化、公式化了。

概言之，「毛時代」宣揚的抗戰女英雄與國共內戰的女英雄脈絡一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型：(1)女烈士型，例如東北抗日聯軍的趙一曼(1905-1936)。1950 年中共剛確立政權之後就上映的電影《趙一曼》，以趙本人的故事為素材，把趙塑造成男性化的高大人物。她是工人運動的領導者，抗聯的作戰指揮官。在得知丈夫犧牲的消息以後，不掉一滴眼淚，在日本人的監獄中受嚴刑拷打而堅貞不屈，最後高呼：「共產黨萬歲！」義無反顧地走向刑場。[30] (2)英雄母親型，如戎冠秀(1896-1989)。她是河北省的一個普通農民，1938 年入黨，積極組織當地的婦女參加抗戰活動。1944 年，晉察冀邊區政府授予她「子弟兵的母親」這一榮譽稱號。[31] (3)「從奴隸到勇士」模式。例如東北抗日聯軍女戰士徐雲卿在她 1960 年發表的回憶文集《英雄的姐妹──抗聯回憶錄》一書中，講述了她和其他女兵是如何在共產黨的教育下，從貧窮的農家女兒迅速成長為抗日戰士的經歷。[32] (4)「從資產階級小姐到共產主義者」──林道靜型。林是小說《青春之歌》(1958)及同名電影(1959)中的主人公。作者楊沫根據本人經歷創作。楊背叛了自己的封建家庭，1938 年加入共產黨，在晉察冀邊區工作。小說描寫了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到 1935 年北

---

30 沙蒙導演，《趙一曼》（東北電影製片廠，1950）。

31 戎冠秀編輯組，《戎冠秀》（北京：新華出版社，1990）。本書匯集了 1940 年代、1960 年代和 1980 年代時期發表的報紙文章。

32 徐雲卿，《英雄的姐妹——抗聯回憶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

京一二九學生運動期間，林道靜如何在男性黨員和女性榜樣的引導下，洗刷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搖擺和無知，加入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隊伍。[33]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全國婦聯和《中國婦女》雜誌關閉。楊沫的《青春之歌》和文革前的絕大部分文學文藝作品成了「封資修」、「大毒草」。中國的舞臺和銀幕上只有 8 個革命樣板戲加上少量的其他作品。[34] 這類極左文藝作品仍然保留了文革前女烈士、英雄母親、從奴隸到勇士幾類女英雄模式，但刪除了資產階級小姐到共產主義戰士的形象。文革中，知識分子成了排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的「臭老九」，他們對共產黨事業的投身自然被抹殺掉了。與文革前的神化女英雄相比，文革中樣板戲塑造的女英雄成了更加英勇、傳奇、男性化的「超人」。正如學者孟悅指出的，樣板戲把一切社會罪惡歸結於階級壓迫，而不再涉及婦女所受到的性別壓迫。[35]

1978 年，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發生了巨大的

---

33 楊沫，《青春之歌》（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同名電影導演陳懷皚、崔嵬，（北京電影製片廠，1959）。

34 8 個樣板戲是戲劇《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和交響樂《沙家浜》。另外的樣板戲還有戲劇《杜鵑山》、《龍江頌》、《磐石灣》和《平原作戰》。見 Bell Yung, “Model Opera as Model: From Shajiabang to Sagabong,” in Bonnie S. McDougall, e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47.

35 Meng Yue, “Female Images and National Myth,” in Tani E. Barlow,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8-124.

變化。變化之一，是歷史研究重獲新生，歷史得到重新詮釋，特別是 20 世紀的歷史。婦女史領域中，全國婦聯領導組織了從北京到地方的大規模研究工程，搜集整理各類資料，出版中國婦女運動史料和各地區婦女革命歷史的大量文獻資料，及婦女文集、傳記和抗戰時期的歷史故事。與此同時，對 20 世紀歷史的開拓性研究也吸引了大批的高等院校，以及從北京到地方的各級社會科學院學者。隨著婦女學作為新時期嶄新學科的興起和發展，婦女學學者也不斷出版婦女史方面的文章和專著。2003 年，婦女學專家李小江出版婦女口述史《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其中的口述人有抗日女戰士、根據地的百姓、淪陷區的普通勞動人民，以及受侵略者迫害的「慰安婦」。[36] 2011 年，中華女子學院展開大規模對各種年齡和背景的婦女進行個人歷史採訪記錄的工作，將口述史保存於該院的女性圖書館。這項工程無疑對婦女史的深入研究有重大的推動意義。

許多「大眾媒體歷史學家」──作家、新聞記者、戲劇、影視紀錄片和故事片的編劇和導演──也投入了對歷史的重新開拓、重新評價和解說，製作了大量以共產黨領導人和早期革命歷史為題材的「紅色」作品。[37] 1990 年代以來，對「紅色經典」文藝作品的重新打造更是不遺餘力。「紅色經典」

---

36 李小江主編，《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37 Geremie Barmé 曾著論探討此一風潮，參見“History for the Masses,” in Jonathan Unger, ed.,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1993), pp. 260-286.

指的是 1942 年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來出品的革命文藝作品。為滿足老一代人的懷舊心理，年輕一代對歷史人物事蹟的興趣，重新打造的紅色經典保留了原作品的主要人物和基本故事情節，但是採用了更現代化的技術，為追求真實性去原地拍攝，啟用的演員更年輕漂亮，對歷史故事的解說融入了後毛的觀點。紅色題材和「紅色經典」的出現有很多原因，有的是為了顛覆「毛時代」的造「神」，把神化了的共產黨人演繹為普通的人；[38] 有的是為了市場經濟的利潤，娛樂消費社會的需求，把共產黨人商業化、浪漫化、性感化。總之，新時期的紅色題材作品更多地表現了共產黨人作為普通人的人性特點。[39] 例如，與 1950 年的電影《趙一曼》比較，在 2005 年的紅色經典《我的母親趙一曼》中，趙一曼的形象年輕漂亮有風度（畢竟趙被害時只有 31 歲），更女性化。整個電影由她兒子的旁白和與想像中母親的對話來講述，凸顯她作為一個母親的人性化面向；亦即這位母親投身抗戰，是為了下一代兒子的幸福，兒子是她力量的源泉。在她走上刑場的時候，腦海中浮現的不是共產黨的旗幟，而是兒子的形象。[40]

紅色題材和紅色經典的文藝作品將共產黨人物人性化，緣自於改革開放時期大環境的變化：政治意識形態話語

---

[38] 大陸第五代電影導演對中共的英雄觀提出了挑戰。見戴錦華，《斜塔瞭望：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9），頁 35-66。

[39] 吳瓊，《中國電影的類型研究》（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頁 94-98。

[40] 孫鐵導演，《我的母親趙一曼》（福建電影製片廠，2003）。

霸權逐漸鬆動，經濟市場化和消費社會對娛樂和利潤的需求，西方觀念衝擊中國；同時在中國社會出現的「性革命」開闢了對女性氣質特徵、性行為、女性身體欲望等各種問題的研究空間。[41] 紅色作品中出現的革命加戀愛主題，也反映了這方面的開放。

二、女兵回憶與重現抗日戰爭中的新四軍

在上述重新審視歷史的背景下，新四軍女兵出版回憶錄重現了女兵在抗戰中的鬥爭生活經驗。

七七事變後，國民黨和共產黨同意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 年 8 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共 4.1 萬人，接受國民政府的指揮；後編制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42] 1937 年 10 月，華中華南 8 省（江西、福建、廣東、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14 個游擊區的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開始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當時主力約 1 萬人。部隊很快吸引了大批城鎮鄉村的知識青年和技術人員，以及地方武裝和幫會組織。1941 年 1 月，國共兩黨的衝突達到高潮，導致皖

[41] 關於「性革命」，參見 Harriet Evans,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New York: Continuum, 1997); Wendy Larson, “Never This Wild: Sex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5: 4 (1999), pp. 423-450; Rechard Durger, *Behind the Red Door: Sex in China* (Hong Kong: Earnshaw Books, 2012).

[42] 岳思平主編，《八路軍》（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頁 19-24。

南事變（新四軍事件）以後，[43] 新四軍在 1941 年 1 月下旬重建軍部，繼續發展。抗戰八年中，新四軍在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 7 個省分打擊牽制了 16 萬日本軍隊，23 萬偽軍，作戰 2.2 萬餘次。到 1945 年，新四軍的主力增長到 21.5 萬，地方武裝 9.7 萬，建立了八處根據地，總面積 25.3 萬平方公里，人口 3,420 餘萬。[44] 是中共抗戰時期遠離延安黨中央的一股重要軍事政治力量。

然而，如前所述，新四軍的歷史因政治原因在毛澤東時代被邊緣化。在改革開放、重新評價歷史的大背景下，倖存的中共老一代開始自己書寫和發表回憶錄。曾任新四軍高級將領的粟裕，在他 1978 年 6 月 15 日皖南雲嶺新四軍紀念館的講話中指出：「新四軍在敵人最重要的後方──長江兩岸廣大地區堅持鬥爭。這支武裝力量對敵人是很大威脅，牽制敵人相當數量的兵力。新四軍是在敵、偽、頑三方面夾擊中發展起來的，是在艱苦鬥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有些人是不瞭解情況，甚至有些瞭解情況的同志也不宣傳。我們要去宣傳！」[45] 言下之意，過去新四軍歷史被掩蓋，現在要宣傳新

---

43 關於皖南／新四軍事件，在當時國共兩黨以及後來的史學界，一直有很大的爭議。見 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 pp. 544, 570-572;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p. 64-69; Lanxin Xiang, *Mao's Generals: Chen Yi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pp. 92-95.

44 丁星主編，《新四軍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頁 1-3。新四軍的組建，又見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p. 27-31.

45 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網址：http://www.zhonghuahun.org/blog/tushu.php?ac=inlist3&bvid=11385&bid=327&id=49（2014 年 7 月 31 日檢索）。

四軍，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事績；新四軍老兵最有發言權。

與此相呼應，新四軍女戰士出版了她們的回憶錄，目的是為了重新確立新四軍在抗日戰爭史上的地位，但更是為了讓新四軍女戰士的貢獻得到應有的肯定。《鐵軍巾幗譜》的編者在序言中提醒人們：「在新四軍的各個部門、多條戰線上都有女兵們的身影和足跡，……為抗日隊伍的發展，為根據地的建設，為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出生入死、甘灑熱血寫青春。」[46] 1980 年代，文革對中共威信的重挫和外來思潮的湧入，使相當多數的年輕人思想產生迷茫。王于畊體認到她有責任告訴青年一代，他們的青春是如何度過的，所以不但自己寫回憶，還鼓勵丈夫老新四軍將領葉飛出版回憶錄，並組織動員新四軍的老戰友共同書寫。[47]《中原女戰士》一書的主編朱虹「出於一種從婦女解放角度考慮的使命感」組織編寫回憶。[48] 她更為明確地強調：「中國婦女的命運始終與民族的、階級的革命、社會的變革緊密相連、息息相關。要瞭解整個的革命運動，而不瞭解革命婦女的鬥爭，是不全面、不完整的。」[49]

朱虹出生在一個中醫世家，曾就學於漢口和重慶。1938 年 7 月參加革命，1944 年轉到新四軍。抗戰中，先後擔任過教師和報刊記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她一直在新聞

46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16-17。

47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頁 274。

48 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641。

49 朱虹，〈前言〉，《中原女戰士》，上輯，頁 2。

部門工作。文革以後參加了抗日戰爭歷史的編寫工作。1988 年才剛離休，便開始新四軍女兵回憶錄的組織工作。當時老兵中最年輕的也已經將近 70 歲了；女兵人數究竟是多少也不清楚。朱虹起初蒐集到三百多位女兵的名字，1994 年增加到九百八十多人。[50] 她們之中的大多數沒有機會公開講述自己的歷史，但至少在這本書裡留下了自己的名字。[51]

在被歷史埋沒多年之後，公開出版回憶錄為這些女戰士開闢了自我書寫的公共空間。由於篇幅所限，作者必須從漫長的記憶中作出選擇，大多數人只寫一段往事，一個重要關頭，或一個人物。在選擇性回憶中，新四軍女兵想要強調的是革命樂觀主義、英雄主義，堅苦卓絕中的戰友情深，軍民的魚水相依。她們很少提及內心的恐懼困惑和衝突，即使提到，也是為了說明她們如何戰勝困惑。這也許因為在她們看來，抗戰是一場民族解放的正義戰爭，更值得記住的不是戰爭的殘酷，而是殘酷中顯示的英雄氣概。同時 1990 年代中國的政治形勢仍然有「毛時代」左派的影響，出版審查的限制使老戰士自律自我約束，刻意選擇積極方面的記憶。

她們選擇性回憶的一個特點就是不批評黨的陰暗面。如果她們批評 1942 年的整風錯誤和 1966-1976 的文革浩劫──兩個中共公開承認的錯誤運動，在文革後當她們所受的不公平得到了平反，名譽、地位和待遇得到恢復以後，她們大多數人的態度是對黨感恩戴德，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堅貞不渝，

[50] 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613、641-643。
[51] 名單見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630-640。

認為應該原諒共產黨就像子女原諒父母一樣。1927 年入黨的曾志在〈無怨無悔〉文中說：「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我犯過錯誤，受過處分、批評、警告、嚴重警告、留黨察看，各種處分都有過，而且不只一次。……延安整風時，被禁閉一年零四個月。」但是，她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對黨的忠誠絕沒有任何動搖。[52] 即使被黨不信任仍「無怨無悔」，也是曾志和其他女兵所想表達的一種中共女性的道德價值。

選擇性回憶的另一個特點是避開黨內敏感的政治問題。這種保持沉默的態度恐怕是因為許多歷史問題太複雜，牽扯太多的因素，不便說，也難以說清，就只能不說罷了。最明顯的例子是關於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皖南事變中的決策問題。中共中央在 1941 年 1 月發布的〈關於項英、袁國平錯誤的決定〉中說，皖南的失敗「乃項袁一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53]《中原》不曾提到項英，對皖南事變只簡單地按官方的解釋，指出是國民黨反共所造成。《巾幗譜》中，只有皖南事變的倖存者毛維青在回憶中明確地說，皖南事變時，「由於項英副軍長的右傾，以至貽誤了時機，陷入了重圍。」[54] 有 2 篇對項英稍帶而過。[55] 在新四軍子弟所寫的文章中，一篇是皖南事變倖存者周臨冰的兒子回憶母親。周臨冰當時是軍部機要譯電員，開始隨軍長

---

52 朱虹，《中原女戰士》，中輯，頁 3-4。關於曾志，詳見她的《一個倖存的革命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53 丁星主編，《新四軍辭典》，頁 137。

54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277-297。

55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23、341。

葉挺突圍，後逃出包圍。文中對項英沒有負面評價，而是提到母親 1994 年到南京憑弔項英，2001 年到皖南參加項英紀念塑像落成典禮；並和他人籌措拍攝新四軍電視劇，「為了教育後人和真實反映新四軍的軍貌」。[56] 另一篇是袁國平之子袁振威回憶母親邱一涵。這篇回憶沒有提到項英。作者回憶他小時不知父親的情況，還是從小夥伴那裡得知父親是在皖南事變中犧牲的。當他後來詢問母親詳情時，母親不正面回答。她 1956 年去世時，袁國平仍「蒙受著不白之冤」。作者無意詳細解釋內情，只說直到 1978 年以後，袁國平才「得到了公正的評價」。[57] 朱強娣的《新四軍女兵》對周臨冰、邱一涵、袁國平都有介紹，並有專門一章講述皖南事變中的女兵，但也沒有涉及項英等人的責任問題。[58]

《巾幗譜》中有幾篇皖南事變後被國民黨關押的倖存者所寫的文章。[59] 共產黨對於曾經受俘或曾脫離與黨的聯繫的人，總要審查，要求他們寫出書面材料。[60] 可以說，這些女戰士選擇回憶皖南事變，一方面是在描述艱險的經歷，一方面也是在證明她們英勇不屈，對黨的永遠忠誠；還有一層意義是補充歷史。《中原》一書的作者大多是新四軍五師的老

56 曾克宏回憶母親周臨冰，見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353-357。
57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137-145。
58 朱強娣，《新四軍女兵》，頁 139-142、138-174。
59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235-262。這篇長達 30 頁的文章作者注明為「原『女囚隊』部分老同志」。文中只提軍長葉挺。又見頁 310-330、427-437。
60 關於中共的審查自傳規定，詳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27-30。

戰士，沒有經歷過皖南事變。但書中有很多關於「中原突圍」的回憶。這一事件發生在 1946 年抗戰勝利之後。在原新四軍突破國軍的重圍時，大部分「老弱婦孺」按指示隱蔽身分化裝或編成小組，或自行轉移，中原女兵大多有此突圍的經歷。[61] 她們的回憶也同樣是為了證明女戰士的英勇、忠誠，以及填補新四軍女性歷史的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新四軍老戰士王于畊在 1991 年完稿的〈長江的女兒──記楊瑞年同志〉，揭示了黨內的陰暗面。楊瑞年(1916-1942)，蘇州女師畢業後當過教師。1937 年參加抗戰。她工作突出，有獨特的個性，敢說敢為，敢於發表和領導不同的看法。因為和一位紅軍男性幹部有友好關係，雖然對她而言只是友誼，但兩人都受到了領導的批評和周圍人的非議。楊當時想到了「女權」和「婦女解放」。按她那一代知識女性的理解，她有交友的自由，但在當時新四軍中，輿論顯然還不能接受男女之間的交往。更大的委屈是，楊背上了「托派」嫌疑，不被黨信任，一直不能入黨。在皖南事變中，楊被關進集中營，1942 年遭國民黨槍殺後也仍然沒能成為黨員。[62] 電視連續劇《新四軍女兵》採用了王對楊瑞年的回憶。這部以「紅色青春」、「紅色浪漫」、青春偶像為主軸的故事，挑戰了毛澤東時代的價值觀。以楊瑞年為原型的向瑞雲是劇中的主人公，她受到種種委屈，但仍堅持為民族解放而獻身。與她對照的人物是紅軍時代入黨的杜鐵英。

---

[61] 朱虹，《中原女戰士》，中輯，頁 272-406；下輯，頁 545-603。

[62] 王于畊，〈長江的女兒──記楊瑞年同志〉，收入王于畊，《往事灼灼》再版，頁 124-148。

在受過蘇維埃時期共產黨內派別鬥爭的迫害以後，她變得左傾，領導工作作風僵化，不信任知識分子，表現了缺乏人性的扭曲人格。電視劇還凸顯戰爭和愛情的主題，描寫了五對新四軍戀人的愛情。可以說，隨著中國大陸話語空間的逐步開放，歷史詮釋顯現多元化，劇作者塑造了另一種共產黨人的英雄形象：知識青年出身，受到組織的冤枉打擊，而仍堅信共產主義的理想。

三、戰爭回憶的解讀：女性視角的介入

新四軍女戰士出版回憶錄的意義還在於她們的書寫來自女性的視角，傳達了女性的聲音，使我們能夠把女性作為一個單獨的分析主體，瞭解戰爭中獨特的女性經驗。同時，自我書寫作為一個重建自我的過程，[63] 使我們能探討她們的記憶特點，看這些 70、80 歲高齡的老共產黨員，在共產黨進行「資本主義」革命的 1990 年代，如何通過自我書寫來表達自己的人生價值取向。

和「毛時代」神人超人模式的抗戰女英雄比較，新四軍女兵回憶錄使中共女性比較人性化、普通化。從回憶中讀者可以看到她們的家庭背景、政治選擇、人生價值、她們的工作、友情、愛情、婚姻和做母親的經歷。

---

63 關於自我書寫和重建自我，見 Carolyn Steedman, “Enforced Narratives: Stories of Another Self,” in Tess Cosslett, Celia Lury and Penny Summerfield, eds., *Feminism and Autobiography: Texts, Theories, Method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25-39.

從女性視角出發，她們的回憶明確指出戰爭對女性比對男性更為殘酷，女兵經受了比男兵更艱苦的磨練。工作中她們不僅和男兵一樣行軍轉戰，和男性幹部一樣承擔各種工作，還要盡到一個妻子和母親的責任。《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的前言說，他們的母親「為民族的解放新中國的誕生和成長無私奉獻，她們在開國元勳的身邊生活，分擔著他們的辛勞和困苦，經歷的磨難在一些時候甚至更多。只是因為她們的身分很特殊，很少有書籍或文章專門介紹她們。」[64] 戰爭歷史忽視遺忘女性，也是另一種殘酷。

《中原女戰士》的主編新四軍老戰士朱虹，還指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出書背景，或者說是話語環境，即中國大陸在社會被商品經濟猛烈衝擊下，男女不平等的現象非常明顯，女性正面臨著被商品化、被物化、喪失自我的危險性。書籍出版和影視文藝為追求商業利潤，產生了許多庸俗消遣性娛樂作品。對此，朱虹感到有必要提醒人們老一代的革命理想，鼓勵女性追求自強自尊自愛。她指出，女兵回憶中的人物「肯定比時下流行的某些物欲橫溢、醉生夢死、風花雪月、無病呻吟、虛無遁世、調侃人生、情殺鬥打之類淺薄庸俗的所謂作品，更有價值，更具有生命力。」[65] 儘管女兵們

64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頁 2。

65 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642。在此感謝匿名審評人之一的指正，使我更明確認識到朱虹反對商業化中的腐敗，強調女性要自尊自強的意義。

沒有在回憶中對眼下的社會作出很多的批評，但她們的自我書寫凸顯的是已經不再被大多人認同的為理想和民族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的價值觀念。她們最後選定了「中原女戰士」作書名，為的是強調戰士的稱號，以代表為民族獨立奮鬥的崇高精神。戰士的日常生活不一定可歌可泣，但戰士的行為和可歌可泣的事業相關。女戰士與入侵的敵人搏鬥，與自身的弱點鬥以求自強。抗日戰爭造就了她們成為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的戰士；使她們從「自尊、自信、自愛、自強」走向「自立」。[66] 參與戰爭提高了她們的社會地位。她們之中許多人背叛了資產階級家庭而投入革命，一生無怨無悔，所以她們的故事也是可以被官方當樣板來提倡的。

必須指出，新四軍女兵的回憶和新四軍紅二代編寫的傳記，所採用的女性視角並沒有形成與中共的婦女理論相違背的觀念。基於馬克思女權主義的中共婦女理論堅持認為，婦女的根本解放是階級鬥爭的一部分。不少中國婦女學研究者也同樣認為，中國的婦女運動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運動一樣，從一開始就是民族解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西方女權運動為自身爭取平等的目的不同，中國婦女運動的出發點是救國，婦女的民族意識高於「女性意識」和個人意識；婦女解放是民族解放鬥爭的一部分。[67]

---

66 朱虹，〈前言〉，《中原女戰士》，上輯，頁 2-3。

67 李又寧，〈中國新女界雜誌的創刊及內涵〉，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輯 1，頁 182；李小江，〈導言〉，收入李小江主編，《讓女人自己說話》，頁 3。

新四軍的女兵除了抗戰前的老黨員老紅軍以外，還有很多來自各地的知識女性、失業女工、童養媳和愛國華僑。[68] 和中共的其他軍隊相比，新四軍的特點是平均年紀最輕，女性比例高，城市文化特徵最明顯，[69] 而且具有較高的文化水準。誕生在經濟、文化發達的長江中下游的新四軍，從一開始就吸引了大批的男女知識青年、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上海一處的地下共產黨組織在 1938-1945 年間向新四軍輸送了學生、學者、醫生、護士、技術工人（印刷、造鈔、通訊等）、店員等至少 2.1 萬人（上海自動加入新四軍的人不算在內）。便捷的地下交通線在一兩天內就能把人員從上海輸送到蘇中的新四軍駐地。[70] 新四軍實行的知識分子政策，對他們「量才錄用」，讓他們各盡其能；並吸收他們為黨員，敦促他們從愛國主義者轉變到共產主義者。[71] 到 1941 年 10 月，新四軍中 60%的營級和營級以下的幹部是知識分子；80%-90%的連級及連以下的政治指導員都由大學生或中學生擔任。[72]《鐵軍巾幗譜》一書有 74 篇回憶錄。至少有四十多篇提到參加革命前，她們已經是中學或大學的學生，有 4 人是專業

68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2-3。

69 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 p. 50.

70 張文清，〈深邃淵源，特殊基地——上海與新四軍攜手抗日〉，收入張雲主編，《新四軍與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 8-9；晏蔚青，〈上海對新四軍的人力支持〉，收入《新四軍與上海》，頁 138-143。

71 賈秀堂，〈新四軍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及其重大作用〉，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網頁：http://www.n4a.cn/eastday/xsjyj/2012n4a/node639065/node674581/node674583/u1a6941981.html（2014 年 7 月 25 日檢索）。

72 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 p.68.

人員。

《中原女戰士》一書由 194 篇回憶錄所組成。有部分文章提供個人生平，從中可以看到的一個明顯特點是，抗戰時期入黨的女性中許多人出身於富裕的家庭，從地主、資本家、官僚、舊軍官，到富農、中農、紳士、教師、職員、醫生。參加革命時，許多人是中學生甚至大學生，大部分年紀很輕，從 14、15 歲到 21、22 歲不等，所以她們有年輕人特有的激情，因為未婚，使她們離開家庭出去當兵，較少牽掛。

中共的階級理論認為，經濟基礎決定意識形態，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人，必須背叛自己的家庭才能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但面對日寇入侵國難當頭，新四軍急需大批愛國青年，發展擴大自己的力量，階級的純潔性並不是最重要的入黨條件。女兵在回憶錄中，很少刻意地批判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只是在申請入黨時，她們要表示已經背叛了家庭，[73] 有時候要接受比一般家庭出身的人更長的一段預備期（一般是六個月）。但出身於「小資產」的華逸俠，預備期減少到只有一個月的時間。[74] 1938 年，中共湖北省組織部女性部長錢瑛還曾對吸收知識分子入黨過於謹慎的傾向提出過批評。[75]

部分女兵回憶錄中的一個主題，是她們從「資產階級小姐」到共產主義戰士的轉變過程。投身革命是人生一個重大的轉折，標誌著放棄過去的身分，認同另一種全新的、與其

---

73 例如于溪，見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431-435。

74 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440。

75 朱虹，《中原女戰士》，上輯，頁 45。

他普通百姓不同的身分，用她們的語言就是「停止了黑暗中的摸索」，「走向新生」，「加入革命的大家庭」，「投入黨的懷抱」。楊𨗴的回憶說，1939 年初她不辭而別離開上海，和另外 5 人參加了新四軍。從脫去學生時代的旗袍、皮鞋，剪掉長辮，到換上軍裝和布鞋、草鞋，她們經歷了身分改變的第一個儀式。政治課上，她學到了革命的道理，而軍事訓練更把她變成了真正的女兵。[76] 另一個與過去告別的轉變儀式是改名字，一是為了保護家人，免得留在淪陷區的親人受到牽連，二是為表明自己新的身分認同。15 歲參軍的張茜原名掌珠，參軍時查了字典改名叫「茜」，紅色的意思，取染紅世界的含義。[77] 王于畊原名桂英，改「于」字，是家裡同輩男孩排名的第一個字，為的是表示繼承共產黨二哥烈士的理想，像弟弟一樣繼續走哥哥的道路。[78]

大部分回憶的重點不在怎樣從小「布爾喬亞」到戰士的轉變，而凸顯她們如何在愛國、志願、追求平等的理想激情中參加抗戰，重點是她們推動變革的主動性。

戰爭的爆發破壞了人們的正常生活，大部分青年出於保家衛國不當亡國奴的激情，志願加入了抗戰的隊伍。參加抗戰也含有拯救自我的動機。貧苦勞動階級出身的人可以找到經濟出路；對中產階級的人而言，戰爭使經濟惡化，學校幾

---

76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343-352。

77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頁 17。

78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頁 155。

乎全面停課，或遷校或停辦，他們的個人前途黯淡；對所有失去親人和家園，失去就業和就學機會的人，參加抗戰也是擺脫被動困境的一條途徑。[79]

當時有許多熱血青年投身於國民黨領導的抗戰。新四軍女兵為什麼選擇了共產黨？按她們的解釋，1931 年以來，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激起民眾的不滿，七七事變以後，國軍的抵抗無能使人們喪失了對國民政府的信心，而共產黨代表新的希望。有很多人加入共產黨是由於親人父兄的影響；還有很多人是在學校讀書時，經歷了政治化過程而傾向共產黨。共產黨自 1920 年代起即注意利用學校作為宣傳發展的陣地。河南開封北倉女子中學是個突出的例子。1921 年，北倉女中成立。[80] 這所私立學校政治開明，自 1929 年馬戢武任校長以後，學校聘請了幾位有進步思想的教師，其中有 1925 年加入共產黨又與黨失去聯繫的馮素陶。這些老師熟悉近代中國遭受的不平等條約、1911 年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各種新思想。他們經常在課堂上啟發學生思考要追求什麼樣的人生，讓她們看到社會中的男女不平等，勞動人民的痛苦，帝國主義的欺壓，喚醒她們的民族意識和公民責任感。1935 年，在北平學生要求南京政府抗日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鼓舞下，北倉學生和開封其他學校的學生也組織了他

---

79 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 p. 66.

80 原名河南第一女子中學校，1930 年改名為私立北倉女子中學校。陳洪遠，〈北倉女中沿革〉，收入曾克主編，《春華秋實》（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 329-335。《春華秋實》的大部分文章所寫的是該校師生對北倉女中的回憶。

們的抗日請願活動。次年，北倉女生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 年 10 月，學校有了第一個共產黨支部。[81] 抗戰爆發前後，北倉有一百多人參加革命，其中大多數加入了共產黨。[82] 有一個班級共 43 人，40 人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和愛國組織。[83]

除了民族意識和志願報國以外，貧苦勞動人民出生的青年參加共產黨，也出於爭取階級解放的動機。裡希 12 歲起白天在上海一家襪廠當童工，晚上到一所基督教女青年會組織的免費女工文化補習夜校讀書。在那裡，有中共地下黨員向學生宣傳革命，喚起女工的階級意識和反抗資本家和帝國主義的思想。當時，工廠和女青年會是地下中共在城市工作的主要渠道。1935 年裡希參加了抗日宣傳活動。1937 年抗戰爆發後，她在「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從事宣傳工作。1940 年上海地下黨送她加入新四軍。[84]

新四軍有不少來自上海的女工。上海的難民營也是發展抗日力量的主要基地。1937-1939 年兩年裡，上海地下黨從難民營向新四軍輸送了 3,000 人。[85]

Helen Young對紅軍女性的研究說明，她們加入紅軍的目的之一是婦女解放，因為共產黨提倡男女平等，給予她們獨立的身分，應有的地位，使她們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86] 和

---

81 趙新等人，〈迎接暴風雨的一代〉，收入《春華秋實》，頁 177-204。

82 馮素陶，〈我懷念「北倉」〉，收入《春華秋實》，頁 168。

83 林默涵，〈春華秋實序〉，收入《春華秋實》，頁 1。

84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427-437。

85 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 pp. 54-55.

86 Helen P. Young, “Why We Joined the Revolution: Voices of Chinese

紅軍女性一樣，抗戰時代的女性參軍也含有性別動機，為了得到平等和獨立的社會身分。不論出身哪個階層的女性，都曾感受到重男輕女的歧視；父權壓迫促使女性對社會不滿，懷抱走出家門的迫切願望。[87]《鐵軍巾幗譜》中有幾篇回憶錄中明確談到對擺脫性別壓迫的嚮往，談到歷史傳說中的女英雄和共產黨隊伍中的女兵榜樣，帶給她們掙脫束縛的力量。《中原女戰士》一書中，至少有 9 位女兵曾經是童養媳。無助的處境使她們從小渴望溫暖，也培養了她們的反抗性格。離開封建家庭參軍，使她們把個人的反抗變為集體反抗的一部分。還有人為逃避包辦婚姻而參加革命。例如張明出身貧寒，念過兩年私塾；婚後逃出夫家去南京做工，1937 年投身共產黨。[88] 楊錚 1910 年出生於安徽一個地主家庭，在安徽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以後，不得不隨包辦婚姻嫁了人。在忍受了六年的不幸婚姻之後，她帶女兒離開丈夫。抗戰以後，她們成了難民。1940 年，她帶女兒參加了新四軍，1941 年入黨；女兒（1928 年出生）也在一年後入了黨。[89]

四、戰爭的性別化：女性回憶的自我展演

Women Soldiers," in Nicole Dombrowskic, ed., *Women and Wa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nlisted with or without Consent* (New York: Garland, 1999), pp. 92-111. See also Helen P. Young, *Choosing Revolution*.

87 例子參見朱虹，《中原女戰士》，上輯，頁 379-386；下輯，頁 173-188；頁 372-375。

88 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219-227。

89 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66-77。

抗日戰爭八年，新四軍女戰士大部分從事的是各種與傳統性別分工相關的女性類工作：醫護人員、秘書、機要員、報話員、教師、文藝工作者、宣傳工作者、婦女工作幹部。從女權主義的觀點分析，這種按傳統性別分配的工作延續了父權主義的性別歧視。女兵本人的回憶並不認同這種觀點，她們相信自己從事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強調她們改變社會的主動性，堅信沒有婦女的參與就不會有戰爭的勝利。

新四軍的前後方醫院、救護隊、流動婦產醫院有相當多的女兵。章央芬在名為〈自豪的記憶〉中說，1938 年她經同學吳之理介紹，從上海到南昌參加了新四軍，先後在新四軍的後方醫院和前方醫院當醫生。1939 年 9 月，她回到上海探親時，家人勸她去美國進修，她沒有同意，又回到了艱苦的新四軍戰地生活，因為在她看來：「那裡的人們正在為了祖國獨立，民族自由，人民幸福而艱苦地戰鬥，那裡需要我，是我應該去工作的地方，有我人生的價值。」[90] 朱強娣在《新四軍女兵》一書中，對章央芬有更多的背景介紹：吳之理是她的戀人、後來的丈夫；他們共同參軍受到了葉挺軍長的鼓勵，章是新四軍中第一位女軍醫，和吳之理共同參與了新四軍醫院的建設和發展。[91]

---

[90]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201-209。Agnes Smedley 在論著裡提及這家醫院，以及章央芬是其中唯一的女軍醫。參見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3), p. 267. 1938 年初，新四軍軍長葉挺邀請了一批醫務工作者，從上海到皖南參加新四軍。參見李秋華、劉勉鈺，〈新四軍南昌軍部與上海〉，收入《新四軍與上海》，頁 30。

[91] 朱強娣，《新四軍女兵》，頁 98-109。

1938 年 1 月，新四軍建軍不久後組建了戰地服務團。服務團人數最多時高達 400 人，半數是女性。服務團下設民運、戲劇、歌詠、繪畫、舞蹈等組，集中了許多藝術學校的學生。他們定期接受軍事訓練，每天出早操，放哨站崗，又透過經常的政治學習，以提高政治思想水準，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念；並聽領導的報告，瞭解各項政策。服務團的成員主要工作是文藝和政治宣傳。成員每天排練節目，到街頭宣傳，教唱抗日歌曲，定期為部隊和當地的民眾、政府演出。[92] 他們的演出充分發揮了藝術在政治工作中團結、宣傳、鼓動、娛樂的巨大能量。1939 年 11 月，新四軍在保衛皖南繁昌的戰役中打擊日軍獲得勝利。王于畊和戲劇組的幾位男編劇一起寫出了三幕話劇《繁昌之戰》。話劇組為軍、民、政部門上演了 7、8 場，反應熱烈。1940 年有篇文章描寫了一次演出的盛況：[93]

> 不知是什麼時候，天空已在下著細雨，但是群眾的熱潮，還是不斷的歌唱。……第二幕是《征歸》。演到中國兵和日本兵打仗的時候，青年、婦女、兒童又唱著：「……同胞起來，殺死日本鬼子！殺！」「殺！……殺、殺、殺！」1000 多的群眾同時呼出，一個 79 歲的老太婆也呼著。
>
> 劇終了，雨下大了，人們還站著不散，歌不斷地唱著。這就是同仇敵愾！這就叫萬眾一心！

---

92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頁 20-24。

93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頁 173-175。

1940 年 2 月，為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王于畊和另一位女編劇通過對二十多位女兵的採訪寫出了《大時代的女性》的劇本，劇中人物由演員自己演自己參戰的道路和貢獻。[94] 女性不只是戰爭的受害者，更是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力量。

新四軍的民運隊（民眾運動工作隊）有許多女兵。中共在抗戰中極力培養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成為骨幹，派他們到基層宣傳組織民眾支持抗戰。他們的民運工作為共產黨的發展、根據地的建設和擴大。[95] 新四軍初建時，當地百姓不信任他們。民運隊隊員耐心細緻地向群眾闡釋新四軍是抗戰的隊伍、人民的軍隊。他們從幫助窮困農民解決生活生產困難開始，向地主富農借糧借款給窮人，開展減租減息，教導文化、教唱抗戰歌曲，組織成立農民、婦女救國會、兒童團，動員百姓參軍，支持抗戰。在男女有別、傳統意識強烈的中國鄉村，新四軍民運隊的女兵挨家挨戶給婦女工作機會，有的按當地風俗和婦女結拜姊妹，建立感情和信任，使當地婦女不僅支持新四軍，為部隊洗衣、做軍鞋、動員丈夫兒子參軍，而且讓她們理解女性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像那些女兵一樣，為自己爭取平等權益。[96]

---

94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頁 175-176。

95 丁衛平，《中國婦女抗日戰爭研究，1937-1945》（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92-196；Jane Price, “Women and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1-1945,”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7:1;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a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M.E. Sharpe, 1995). 關於新四軍的民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詳見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arts two and three.

96 例如朱虹，《中原女戰士》，中輯，頁 217-221；北京新四軍，《鐵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女性從事的工作是中性的：民運、文藝、宣傳、新聞、報刊、政治文化教育、黨的組織工作、地下工作。在男性明顯居多的領導崗位中，也有小部分女性領導人。例如陳少敏，曾擔任豫鄂邊區黨委書記。邊區還有一批女幹部任縣區領導職務。[97]

雖然女兵絕大部分屬非戰鬥人員編制，但是由於新四軍處在日軍、偽軍、國民黨軍隊的夾縫之中，新四軍女兵經常參與軍事行動：行軍、轉移，通過日偽的封鎖線，對付日軍的掃蕩。陳少敏是有名的戰鬥指揮員。[98] 1942 年，已經擔任區委書記一職的王于畊也經歷過戰鬥。[99] 鮑有蓀曾是出身名門的學生，參加新四軍以後，以 22 歲的年齡，便組織發展一支游擊隊，幾個月內從 200 人擴大到 700 人；她作為游擊隊隊長，經常配合新四軍對日軍的作戰。[100] 劉潔是淮南一支游擊隊的隊長，也是隊裡唯一的女性，在新四軍對國民黨軍隊的作戰中有重要的貢獻。[101] 女兵在戰爭的另一類軍事參與是在部隊有行動，或日本人大規模掃蕩時，部隊經常安排有孩子的家屬疏散到隱蔽的山區，在可靠的老鄉家「打埋伏」。在那種情況下如果遭遇敵人，她們只能依靠自己和老百姓，處境更為險惡。[102]

軍巾幗譜》，頁 210-216。

97 朱虹，《中原女戰士》，上輯，頁 2、6-7。

98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8-9。

99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175-176、176-177。

100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549-553。

101 北京新四軍，《鐵軍巾幗譜》，頁 554-557。

102 例如陳毅夫人張茜就有過這樣的經歷。見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

Gilmartin對 1921-1927 年代的中共性別關係所作的研究表明，中共女性在男性領導下從事從屬性工作，接受了黨內「二等公民」的地位。在家庭生活中，她們承擔了養育孩子的責任，但是並未對這種不平等提出質疑：「絕大多數革命女性在那時沒能打破心理和各種相關的障礙，去擔任與男性平等的政治角色。看來，她們並沒有對她們在養育孩子方面要負擔更多的責任提出質疑，而認為這是她們的生理功能所決定的性別角色的延續。」[103] 女權主義學者的研究也指出，抗戰時期，中共女性黨員從屬於中共的「公共父權」。黨干預個人生活，決定黨員的婚配。[104] 這種領導「包辦」婚姻跟儒家父權觀念下的傳統家庭制度沒有太大的區別。[105]

中共女性如何看待這類的不平等待遇？大陸學者朱鴻召在關於延安女性的婚姻家庭的研究中指出，這些女性逃離了舊家庭投身革命，在革命婚姻中有光榮和痛苦，甚至付出血的代價，「但她們沒有因此而發出公開的歎息或尖叫，只有用更加革命的外衣包裹起那曾經受傷泣血的心靈。」[106] 許多新四軍女兵在自己的回憶中，提到她們的婚姻和為撫育孩

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頁 43-46。

103 Christina K.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112-113.

104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 172.

105 Helen P. Young, “Threads from Long March Stori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xperience of Women Soldiers,” in Mechthild Leutner and Nicola Spakowski, *eds.*, *Women in China: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 182;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 170.

106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213。

子作出的犧牲，抑或放棄孩子時的痛苦。但是她們的態度並不像朱所說的那樣被動無奈，而是透過革命的套語和邏輯，解釋作為一個革命大家庭成員的歸屬感和必要的自我犧牲。

她們在回憶錄中大量使用了「革命大家庭」一詞和有關家庭的比喻：「黨像父親母親」，同志是「兄弟姐妹」，「比親人還親」。家庭在中國傳統社會佔有重要的地位，是儒家道德觀的基本成分。當時很多人加入共產黨，也跟家庭成員、親戚、朋友、同學的影響有關。在離開了舊家庭走上個人獨立道路之際，年輕人需要力量和感情的支援，而共產黨作為一個團體提供了保護、安全感和歸屬感。如林克在她的回憶中所說：「我 7 歲喪母，從小沒有母愛，革命大家庭的友情，使我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溫暖，感到無比快樂和幸福，對同志們的愛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恨給予我以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力量。」[107]

在這個革命大家庭裡，女兵在苦難中結下了一輩子、甚至延伸到第二代的深厚感情。[108] 一般而言，男女戰士對年長和職位高出自己的女性稱為「大姐」。但沒有人使用「大哥」來稱呼男性領導。很多女兵十分尊重這些大姐，把她們看作婦女自強的榜樣，把大姐的關懷比作像親人或「母親」一樣溫暖的感情。[109]

---

[107] 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385-386。

[108] 例如張茜、王于畊、凌奔和她們的子女，參見：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

[109] 例子參見：朱虹，《中原女戰士》，上輯，頁 43、60-65；下輯，頁 17-18。

革命大家庭的概念中最重要的是「革命」，指爭取民族解放，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培養共產黨人的道德等。認同高尚的革命理想，讓他們抱持不同於普通人的優越感。認同也使「家庭」成員甘心以革命為名義，犧牲個人利益，服從黨的意志。在婚姻問題上，很多女兵就是為革命而接受了「組織之命，領導之言」的。中共在抗戰中，對部隊婚姻的通行規定之一是「二五八團」：一方滿 25 歲，有 8 年軍齡，是團級幹部或以上就可以結婚。[110] 新四軍裡未婚男性佔絕大多數，黨組織經常為他們介紹女兵作配偶。雖然許多女青年參加革命時，決心抗戰不勝利不結婚，但在領導的說服下，她們接受了革命也需要革命伴侶的想法，同意了黨的「包辦」，並很快成婚。[111] 新四軍女兵絕大多數是在戰爭時期結的婚。「抗日持久戰，戀愛速決戰」是普遍觀點。[112] 在回憶中有人描寫她們的戀愛，如周志方在她的「大姐」領導為她介紹對象時，原不想談戀愛不想結婚，因為兩人差距大，是大姐說服了她。[113] 林居先願意結婚，是因為「黨員要服從黨的調配。」[114]

結婚以後，大部分女兵照舊從事自己的工作，為此很多

[110]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頁 243。朱說，他沒能查出任何具體的條文規定。他根據的是回憶中的記載。在我訪談一對新四軍夫婦時，他們也提到類似說法。又見 Lanxin Xiang, *Mao's Generals*, p. 61.

[111] 例如張俊的婚姻，參見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321-322。

[112]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頁 193。

[113] 朱虹，《中原女戰士》，中輯，頁 135。

[114] 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125。

人不能和丈夫住在一起。她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並以自己能獨立工作而深感自豪。[115]

在回憶中不少人選擇講述她們懷孕、分娩的痛苦和不得不放棄孩子的內心掙扎和放棄的理由。當時人很少有避孕知識和工具，懷孕是普遍現象。[116] 孩子出生以後，全部由女方負責照顧。有些人自己撫養，加上勤務員幫忙；有些人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更多的人不得不把孩子寄放到老鄉家，多年後再把他們接回來。很多嬰兒病死、餓死，和父母失散。和戰爭中其他國家的母親一樣，新四軍母親也認為，戰爭中孩子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的死不是沒有價值的，而是有深刻的意義。[117] 薛平懷孕以後，為墮胎又跑又跳，還是沒有流產。分娩時她隱蔽在一個貧苦農民家潮溼陰暗的小屋裡，沒有衛生條件，之後罹患風濕性關節炎。孩子滿月後，她自己帶不了，只好送到老鄉家寄養。沒有多久孩子得天花死了。她感嘆：「天下父母誰不愛自己的孩子？但在那個戰爭年代，一切都要服從戰爭這個大局。」[118] 牛洛濉有第一個孩子時，開始自己帶孩子隨部隊轉移，下農村工作，但孩子 1 歲以後，實在太難讓孩子跟隨部隊，只好把孩子留給了一家農民。她後來生的兩個孩子都是交由老鄉照看，以後再

115 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237。

116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頁 246 提到中共女性作人工流產。

117 Nancy Scheper-Hughes, “Maternal Thinking and the Politics of War,” in *The Women and War Reader*, p. 229.

118 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469-470。

找回來的。[119] 杜薇說丟掉孩子不是作母親的狠心，這是她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作出的理智的選擇」。[120]

結　論

抗戰八年中，中國婦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從女權主義角度評價，婦女的地位並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本文研究新四軍女性，在她們 70、80 歲高齡時書寫出版的個人回憶錄，探討她們的戰爭經歷，怎樣改變了她們自身的地位，以及她們的自我書寫所包涵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四軍女兵的回憶紀錄中，並沒有形成獨立於中共的政治觀點，她們認同婦女解放必須從屬於民族解放的理論，個人必須服從黨組織的觀念。書寫中使用的話語，大多是中共的政治套語：為革命可以犧牲個人的一切；默默奉獻；黨指向哪裡，就在哪裡戰鬥；軍隊是革命大家庭等等。她們選擇性地凸顯革命樂觀主義，盡量避開個人的內心衝突、政治敏感問題和黨內的陰暗面。

然而，如果我們把她們的回憶錄出版，放在歷史變化的大背景之下，就能看到其中的深刻意義。改革開放時期，大陸出現了對中共歷史的重新研究和詮釋，媒體的紅色主題、紅色經典作品層出不窮。新四軍女兵的自我書寫採用女性的視角，講述女性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歷。比起「毛時代 」塑造

---

119 朱虹，《中原女戰士》，上輯，頁 305-311。

120 朱虹，《中原女戰士》，下輯，頁 447。

的神人化抗戰女英雄，她們筆下的女兵較為真實，塑造了另一類新的革命女性形象。她們講述的故事反映在 20 世紀上半期，有大批受過教育，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女青年為女性平等和民族解放，投身抗戰，在新四軍中從事各種工作，並承擔妻子和母親的重擔。按照女權主義的觀點，她們絕大多數的工作仍然屬於傳統性別分工的女性工作。但女兵在回憶中，強調戰爭對女性比對男性有更為殘酷的一面，她們和男兵一樣做出了貢獻，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她們認同革命大家庭，自豪從中得到歸屬感。她們強調女性改變社會的主動性，和她們的自尊、自信、自強、自立精神，所以她們說戰爭從來不只是男人的事業，沒有婦女的參與就不會有戰爭的勝利。為糾正婦女歷史的邊緣化現象，她們的回憶錄開闢了中共女性個人觀點與自己聲音的公共出版空間。

徵引書目

一、中文書目

丁星主編，《新四軍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

丁黑導演，《新四軍女兵》。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上海電視傳媒公司出品，2009。

丁衛平，《中國婦女抗日戰爭研究，1937-1945》。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

王于畊，〈長江的女兒──記楊瑞年同志〉，收入王于畊，《往事灼灼》再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 124-148。

王于畊，《往事灼灼》再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鐵流：鐵軍巾幗譜》。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網址：http://www.zhonghuahun.org/blog/tushu.php?ac=inlist3&bvid=11385&bid=327&id=49（2014 年 7 月 11 日檢索）。

戎冠秀編輯組，《戎冠秀》。北京：新華出版社，1990。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朱鴻召，《延安曾經是天堂》。西安：陝西出版集團、陝西人民出版社，2012。

朱虹主編，《中原女戰士》，上輯。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

朱虹主編，《中原女戰士》，中輯。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2。
朱虹主編，《中原女戰士》，下輯。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4。
朱強娣，《新四軍女兵》。濟南：濟南出版社，2004。
吳瓊，《中國電影的類型研究》。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
呂芳上，〈抗戰時期中國的婦運工作〉，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頁 378-412。
李又寧，〈中國新女界雜誌的創刊及內涵〉，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
李又寧、張玉法主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
李小江主編，《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李秋華、劉勉鈺，〈新四軍南昌軍部與上海〉，收入張雲主編，《新四軍與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李應芬，〈廣西各縣婦運情況調查總結(1941)〉，收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頁 558-563。
沙蒙導演，《趙一曼》。東北電影製片廠，1950。
沈茲九，《抗戰中的女戰士》。廣州：戰時出版社，193?。
岳思平主編，《八路軍》。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北京校友會，《延水情》。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9。
林默涵，〈春華秋實序〉，收入曾克主編，《春華秋實》。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紀念延安女大五十周年籌委會，《延安女大，1939-1989》。北京：未注明出版社，1989。

孫玉芹、劉敬忠，〈抗戰末期的「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評述〉，《抗日戰爭研究》，期 3，2010，頁 19-27。
孫鐵導演，《我的母親趙一曼》。福建電影製片廠，2003。
師德清主編，《烽火太行半邊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徐雲卿，《英雄的姐妹──抗聯回憶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
晏蔚青，〈上海對新四軍的人力支持〉，收入張雲主編，《新四軍與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張文清，〈深邃淵源，特殊基地──上海與新四軍攜手抗日〉，收入張雲主編，《新四軍與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張西，《抗戰女性檔案》。北京：青年出版社，2007。
張蘇洲、陳丹淮、葉葳葳總監製；陳小津、趙紅梅總策劃，《我的母親：三個新四軍女兵的故事》。上海中航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安徽廣播電視臺聯合製作，2010。
梁惠錦，〈抗戰時期的婦女組織〉，收入鮑家麟主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 359-390。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回憶母親張茜、王于畊、凌奔》。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陳洪遠，〈北倉女中沿革〉，收入曾克主編，《春華秋實》。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陳懷皚、崔嵬導演，《青春之歌》。北京電影製片廠，1959。
曾志，《一個倖存的革命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馮素陶，〈我懷念『北倉』〉，收入曾克主編，《春華秋實》。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楊沫，《青春之歌》。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
賈秀堂，〈新四軍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及其重大作用〉，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網址：http://www.n4a.cn/eastday/xsjyj/2012n4a/node639065/node674581/node674583/u1a6941981.html（2014年7月25日檢索）。
聞黎明，〈關於西南聯合大學戰時從軍運動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期3，2010，頁5-18。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叢書：
游鑑明訪問，黃銘明、鄭麗榕紀錄，《春蠶到死絲方盡：邵夢蘭女士訪問紀錄》(2005)。
張朋園訪問，羅久蓉紀錄，《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1993)。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紀錄》(1995)。
許雪姬、沈懷玉訪問，曾金蘭紀錄，《陳湄泉先生訪問紀錄》(1996)。
趙新等人，〈迎接暴風雨的一代〉，收入曾克主編，《春華秋實》。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蔡暢，〈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的關係〉，收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蔡暢、鄧穎超、康克清婦女解放問題文選，1938-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鮑家麟主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
戴錦華，《斜塔瞭望：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9。
瞭望編輯部，《紅軍女英雄傳》。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
謝冰瑩，《抗戰日記》。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

二、英文書目

Barlow, Tani E.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Barmé, Geremie. “History for the Masses.” In Jonathan Unger, ed.,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Armonk: M. E. Sharpe, 1993.

Benton, Gregor.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Surrey: Curzon, 1999.

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Croll, Elisabeth.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D’Amico, Francin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Women Warriors.” In Lois Ann Lorentzen and Jennifer E. Turpin, eds., *The Women and War Rea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vin, Delia.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Durger, Rechard. *Behind the Red Door: Sex in China*. Hong Kong: Earnshaw Books, 2012.

Evans, Harriet.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New York: Continuum, 1997.

Gilmartin Christina K.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Goodman, David S. G. “Revolutionary Women and Women in the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Wome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The China Quarterly* 164, December 2000, pp. 915-942.

Howard, Joshua H.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s, 1937-195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Larson, Wendy. “Never This Wild: Sex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5:4, 1999, pp. 423-450.

Li, Danke. *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Li, Virginia C. *From One Root Many Flowers: A Century of Famil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3.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a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M.E. Sharpe, 1995.

Meng Yue. “Female Images and National Myth.” In Tani E. Barlow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Nicola Spakowski. “Women’s Militar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of the 1930s and 1940s: Pattern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 Mechthild Leutner and Nicola Spakowski, eds., *Women in China: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

Pan, Yihong.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9: 1, February 1997, pp. 115-130.

Pan, Yihong. “Their ‘Quiet’ Devotion: Communist Wome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7-1945).”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6: 1, Spring 2009, pp. 1-26.

Price, Jane. “Women and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1-1945.”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7: 1, January-March 1975, pp. 19-24.

Scheper-Hughes, Nancy. “Maternal Thinking and the Politics of War.” In Lois Ann Lorentzen and Jennifer E. Turpin eds., *The Women and War Rea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Sheridan, Mary “Yenan Women In Revolution.” In Mary Sheridan and Janet W. Salaff, eds., *Lives, Chinese Working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Smedley, Agnes.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3.

Stacey, Judith.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Steedman, Carolyn. “Enforced Narratives: Stories of Another Self.” In Tess Cosslett, Celia Lury and Penny Summerfield eds., *Feminism and Autobiography: Texts, Theories, Method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Stranahan, Patricia. *Yan’an Wome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no. 26.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3.

Verschuur-Basse, Denyse. *Chinese Women Speak*.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1996.

Xiang, Lanxin. *Mao's Generals: Chen Yi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Young, Helen P. "Threads from Long March Stori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xperience of Women Soldiers." In Mechthild Leutner and Nicola Spakowski, eds., *Women in China: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

Young, Helen P. "Why We Joined the Revolution: Voices of Chinese Women Soldiers." In Nicole Dombrowskic, ed., *Women and Wa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nlisted with or without Consent*. New York: Garland, 1999.

Young, Helen P. *Choosing Revolution: Chinese Women Solders on the Long M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Yu Chien-ming. "Beyond Rewriting Life History: Three Female Interviewees'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War." In Joan Judge and Hu Ying eds., *Beyond Exemplar Tales: 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California: Global, Area, and International Arch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Yung, Bell. "Model Opera as Model: From Shajiabang to Sagabong." In Bonnie S. McDougall, e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Never a Man's War: The Self-Reflections of the Women Soldier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7-45

Yihong Pan*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in July 1937, a large number of educated women left their families to work forthe cause of saving the nation. This essay examinesthe women soldiers of the New Forth Army as a case study, exploring how theydescribed and reflected their political, social, military, and gendered experiences in their reminiscences.

I argue that these women soldiers in their selected memories identify with the ideasof national liberation above women's liberation, the self subordinating to the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nd the army as a revolutionary family; they try to avoid politically sensitive issues.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reinterpretation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in the post-Mao

* Miami University, Oxford, Ohio, U.S.A.

reform era, their writings and publication are significant in redressing the marginalization of women's history in the Mao era, and in opening up a space for Communist women's own voices. These women's writings present the New Fourth Army through a gendered lens. Among various historie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their voices have offered gendered experience in the war, adding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that of the male-dominated narrative. Compared with the stereotyped anti-Japanese super-heroinespublicized in the Mao era, these women's accounts have described more real Communist women, and created different types of revolutionary women, with more self-agency and independence.These women tell their stories as soldiers, wives, and mothers, emphasizing that the war was crueler to women than to men.Although feminist scholars argue that these women soldiers mostly still assumed women's jobs in the war,the women through their own writings try to confirm the meaning of their lives, stressing that they madethe same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as male soldiers. To them, the war was never a man's cause.

Key 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memor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New Fourth Army, women of the New Fourth Army